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曾国藩全传 (下)

第十章 历尽艰辛

一、援浙援闽，均未成行

曾国藩此次出山，本是以援浙为名的。当石达开最初脱离洪秀全出走时，声势极为浩大，所以清廷才肯让曾国藩出山，并指定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支军队归曾国藩直接指挥。待曾国藩与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等面商后，确定曾国藩直接指挥统带萧、张及曾从湖南带出的吴国佐部，又从李续宾处要来朱品隆、唐义训两营。曾国藩计划再加上在江西作战的李元度及曾国荃两部，各部经汰弱留强后，可得一万多人，再调水师近千人支援，便可够拒敌石达开之用。

1858年8月10日，曾国藩从武昌乘船东下，一路上，他的弟弟曾国华以及李续宾、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唐训方等湘军大将先后来拜见，这些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在曾国藩丁忧乡居期间，都仍然把曾国藩看成是他们的最高统帅，当时曾使曾国藩感到非常欣慰，现在见到他们，心里着实愉快。8月19日，船到九江府，九江修建成塔齐布的祭奠地塔忠武公祠，曾国藩在九江只停留了一天时间，还是抽时间到他的这位老部下的祠庙祭奠了一番。20日夜半，座船抵湖口。

两天来，经过当年的战场，曾国藩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三年前血战大败的情景，又想起在江西两年半时间的苦苦支撑，心中的感慨，真好象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来。21日，他病了，

夜不成寐。水师统领彭玉麟准备在湖口修建湘军水师昭忠祠、李续宾又想建湘乡昭忠祠，再加上李续宾已建成的塔齐布祠，曾国藩答应将此三事一并上奏。以后，曾国藩又亲自撰写了《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和《湘乡昭忠祠记》。曾国藩作文的速度并不快，常常需要冥思苦想，但是文章一旦写好，大多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文字，这两篇也是如此。《水师昭忠祠记》中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暴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其在江西艰难困苦之状，可胃跃然纸上。《湘乡昭忠祠记》则既生动，又有理论色彩。《湘乡昭忠祠记》写成已在湘军战胜太平天国以后，他认为湘军的胜利就是因为“忠诚”：

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肉；或苦战而投命，或邂逅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迟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宵哭；可谓极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困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悻。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

石达开离金陵后，本是向浙江进军的，但他在入浙江的门户

衢州遇到了一个会打仗的清军将领饶廷选，曾国藩估计石达开很难攻破这道防线，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石达开久攻衢州不下，不得已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一路向西南行进，其军队一部分进入江西。曾国藩本拟由江西东部赴浙江，他在南昌拜会了江西巡抚耆龄后，便乘船东下，当行抵江西东部的河口时，接到上谕，命其改而援闽。曾国藩遂于9月21日折回弋阳，准备由云际关入闽。随后又改定由杉关入闽，10月15日（九月初九日），抵达建昌府城。

曾国藩在建昌驻扎了近半年时间。这时在江西与福建交界随曾国藩作战的，除了原随他来的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外，还有原驻江西的刘长佑部。由于石达开并无斗志，因此曾国藩并没有什么硬仗可打，可是他的军却一度遇到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疾疫流行。八月底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张运兰部二千七百人，患病的竟一千有余；吴国佐部一千三百人，病了四百多人；刘长佑部四千人，患病一千多。各部因病而死的已近五百，病死者远比战死者多，曾国藩自率湘军出征以来，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当然，这才只是头一次，以后他又遇到比这次还厉害的流行疾疫。

曾国藩驻建昌前后，围困江西吉安太平军一年的曾国荃，终于在阴历八月中秋之月（9月21日）攻陷吉安。这以后，江西省除景德镇一带以外，已没有太平天国的地盘，战局发生了更有利于湘军的变化。占吉安以后，曾国荃把所部兵勇大部裁撤，只留一千二百人作为曾国藩的亲兵营，曾国荃自己到建昌见过曾国藩后，暂回湘乡老家休养。

二、三河喋血，精锐尽失

与曾国藩、胡林翼加紧军事部署的同时，太平天国方面也在进行着调整。自石达开率军出走后，洪秀全一度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但是不久，他就在全朝文武的要求下，废除了他的两个无能无功无德而又极为腐败的兄弟安王洪仁达和福王洪仁发的王爵，又提拔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主持朝政，以赞王蒙得恩为首；又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昌辉的弟弟韦志俊为右军主将，后来又封杨秀清的弟弟杨辅清为中军主将。经过这一番调整，太平天国内部混乱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在这些新提拔诸人中，起作用最大的是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人都是太平天国起义时就参加太平军的广西老兄弟，1858年时，陈玉成只有21周岁；李秀成稍大些，也不过35岁。两人年纪虽不大，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多年的战火考验已把两人锻炼成了有勇有谋、能征惯战的将领，资格也算比较老。太平天国在石达开出走后还能支撑七年，多半要归功于这两人。

1858年8月，李秀成、陈玉成军等太平天国重要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进合击，集中兵力打破清军的江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随后太平军和清军展开大战，陈玉成自湖北和安徽挥师东进，破庐州（今合肥），然后与李秀成军会合，先在乌衣击败德兴阿和胜保军，接着又在江浦击败江南大营来援的冯子材部，而后乘胜进军，一举攻占浦口，清军被歼二万余人，江北大营全面崩溃，解除了来自天京江北的威胁。

江北大营一垮，天京的压力减轻，陈玉成便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步步进逼的湘军了，处在湘军最突出部分的李续宾部就陷入了

危险的状态中。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胡林翼又因母丧丁忧。当胡林翼之母于1858年8月19日去世时，曾国藩已隐约感觉不妙，因为自曾国藩丁忧家居后，湘军全靠胡林翼护持，胡母去世，按规定胡应丁忧，胡若离湖北，湖广总督官文决不会象胡林翼那样关照湘军。曾国藩虽然再度出山，但因没有地盘，没有地方实权，还是非常需要胡林翼的关照。他在写给吉安前线的曾国荃的信中说：“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以成，一旦失所依倚，关系甚重。”胡林翼离武昌回湖南，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又说：“润公已到家否？渠再造江、汉糜烂之区，变为富强，意量之远，魄力之大，中枢似尚知之未尽。守制不出，自是正理，然以时势、物望揆之，又似非得终请者。弟处之事，自润公出位，全局皆呆，恒自哂也。”

曾国藩最感到不安的就是负责进攻皖北的李续宾一军，李续宾部现归湖北方面指挥，而皖北另一路对抗太平军的清军钦差大臣是满人胜保，胜保与太平军作战不行，却忌妒湘军的战功。因此，曾国藩在又一封给左宗棠的信说，安徽战事由胜保指挥，李续宾可能会受牵制。如有为难之处，只有胡林翼能够扶助并让他安全。曾国藩又写信给李续宾和曾国华，告诫他们小心行动，希望南路湘军攻占安庆后，湘军水师可以直达桐城，叫他们不要孤军向北，并特别嘱咐他们要与水师相依，才比较安全。写了此信后，曾国藩还不放心，又写信给驻守后路的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告诉他，李续宾处兵力虽强，但千万不可分军，分则力单，一败则整个形势将为之牵动。曾国藩的担心倒不完全是先见之明，而是与他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求稳求慎的军事思想有关。曾国藩用兵，常不求取胜，先求立于不败之地。他说：“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

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又说：“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之大忌。”“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

后来，清末民国初著名的军事家、湖南邵阳人蔡锷还把这些话收集到《曾胡治兵语录》中。按照曾国藩的做法，每进攻一个地方，攻城须有攻城的部队；另外一定要有负责打援的部队；要有隔断附近敌人各个据点的联络的部队；还要有一支机动部队，按现在的讲法，叫战略总预备队。虽然湘军大多是以少敌多，但一般是要在这些工作落实之后再发动进攻。毛泽东曾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曾国藩的想法与此暗合，看来高明的军事家的做法有很多是一致的。

但是，此时已由不得曾国藩了，咸丰帝闻报庐州（今合肥）失守，非常焦急，他最担心的是太平天国越过长江流域向北发展，再与捻军会合，威胁他的京师的安全。这时，胜保又几次秘密上奏，说李续宾赴援迟援，贻误军机，因此，咸丰帝十天之内七次下诏，命李续宾迅速赴援。其害大，咸丰帝完全是瞎指挥，从湘军的出发地皖西南的太湖一带到胜保驻地定远或庐州，都有数百里。李续宾所部只有八千人，即便冲过太平军的重重防线，也根本无法攻下庐州。

李续宾部本是湘军攻占九江的主力，连续征战，并没有得到休整，胜利之后也有些浮躁。当太平军与清江北大营决战之时，李续宾便奉命乘虚向庐州方向一路进攻，9月21日占安徽太湖，27日占潜山，10月13日经血战占桐城，随后占舒城，进攻三河镇。三河镇距庐州五十里，是太平天国的粮饷重地，庐州、天京都要依赖三河的粮饷接济，所以三河对太平天国极为重要。三河若失，不仅庐州危险，安庆也受威胁。因此，当三河守将吴定规向陈玉成求援时，陈玉成立即奏明洪秀全，请命李秀成也率部往

援，于是，陈、李两军又一次合军作战，等于是倾太平天国主力来攻李续宾，李续宾部立即陷于危险之中。

李续宾本人也觉察出了孤军深入的危险，并且一路每克一城，都要分兵留守，当向三河方向时攻时，他身边的部队已不足五千人。有部下说：安庆未复，军行无后继，腹背受敌，此危道也。并建议回军桐城，与其它清军一同攻安庆，这样各军相距不超过百里，可以互相救援。但李续宾却因为屡奉咸丰帝诏旨催促，不便退军。他离开舒城前向咸丰帝奏报说：“臣所部八千人，因克潜、太、桐城及此间留防分去三千余人，数月以来时常苦战，未尝一日休止，伤损精锐，疮痍满目，现已不满五千人，皆系疲乏之卒。三河一带，悍贼虽多，自揣足以制之，若遇大股援贼，则兵力亦恐难支。要当尽其所能，以报皇上之恩遇而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这话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为防万一，他致信湖北请续派援兵。当时三河附近尚有两支机动部队：一为李续宾之弟李续宜，率四千人驻湖北黄冈；一支为唐训方，率三千人驻湖北英山。但是，湖北巡抚胡林翼已经丁忧在家，湖广总督官文却忌妒湘军的战功。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当李续宾求援信到武昌时，官文说风凉话道：“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李续宾虽然求援，但不愿示弱，遂进攻三河。三河外围，太平军筑有九座堡垒，11月7日，一番血战，湘军攻占了这九座堡垒，在这场战斗中，太平军伤亡七千人，湘军也伤亡一千余人，可见其战况的惨烈。但是，湘军并没有攻下三河镇，太平军守军退入城内坚守。而与此同时，陈玉成的援军已经到达三河附近东、南的白石山和金牛镇，连营数十里，对李续宾形成反包围并切断其后路，后路湘军由西面的舒城增援三河的通路也被切断，稍后李秀成也率军来到白石山，另外还有捻军与太平军配合。太平军的人数，有的人说有十万，有的

人甚至说有三十万。

这个时候，李续宾想退兵也来不及了，但他还要作困兽之斗。11月14日，李续宾挥军进攻陈玉成前锋，陈玉成前锋败退，李续宾命军追击。次日黎明，湘军已追过陈玉成主力大营。这时，突然大雾迷漫，对垒双方近在咫尺，却只闻人声，不见敌面。两军犬牙交错，混战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续宾已无法有效指挥。驻守白石山后的李秀成，听到炮声，立即率所部兵赶到加入战场，守在三河镇内的太平军也从城中杀出，四千多湘军陷入重重围困之中。沙场上刀枪飞舞，炮声隆隆，血肉横飞，这场惨烈的大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李续宾战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一道战死。湘军个别营盘又坚持三昼夜，最后只有几十个残兵败卒逃出。

三河战后，陈玉成、李秀成又挥军进攻舒城、桐城、潜山、太湖，驻守这几个地方的湘军已成惊弓之鸟，再加上李续宾已死，缺乏得力的指挥，遂一路败退。清军都兴阿部也撤安庆围，一直退到宿松，湘军在安徽又只占有一角。

三河战役，对于湘军来说，是犯了孤军深入，轻敌冒进的错误。与咸丰帝的瞎指挥、湖广总督官文以及安徽方面的胜保的忌妒也有关系。但也与湘军的战术缺少灵活性有关。如果是太平军处在李续宾的处境，很可能会迅速大规模的撤退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可是一般来说，湘军善于稳扎稳打，却不善于大规模机动作战。太平天国方面，常常作大范围、长距离的运动战，除了株守金陵一条不变外，常常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此次击破江北大营及三河之战，都是大规模的运动战。三河战役，太平天国方面可以说是成功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而且不是一般的集中优势兵力，简直是集中了太平天国的全部精锐。李续宾，号迪庵，与曾国藩同为湘乡人。罗泽南最得意的学

生，罗泽南临死前，遗嘱罗部湘军由李续宾统带。这是一支真正的百战之师，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为作《李忠武公神道碑》，说李续宾为人“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指太平军）则以人当其脆，而已当其坚。粮仗赐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靡者”。王安定《湘军记》说他选士卒“以知耻近勇、朴诚敢战为尚……所屯军地，百姓耕种不辍，万幕无哗，秋毫不犯。大小六百余战，克四十余城。”

正因为李续宾是湘军第一勇将，所部又是湘军精锐，所以李续宾的惨败，虽然死亡人数并不算很多，但给湘军的打击却是非常沉重的。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胡林翼当时正丁忧在家，一天忽然一士兵快马赶来，报告李续宾三河之败，胡林翼看完败报，突然呕血晕倒，其家人惶骇不已，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胡林翼稍后在一封信中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伤殆尽。”

不仅李续宾所部是湘军的精锐，而且李续宾本人与曾国藩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于曾国藩来说，最为难得的是在曾国藩父丧家居，被剥夺指挥权的时候，李续宾和他的弟弟李续宜仍然视曾国藩为湘军最高统帅，时时向在湘乡的曾国藩报告军情，请示进止。由于清廷迟迟不肯让曾国藩出山，李续宾甚至表示要辞职回家。现在，这一支劲旅就这样全军覆没了，这样一个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部将就这样惨死沙场了。眼看自己的处境刚刚好了一点点，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曾国藩可谓心痛如刀绞。曾国藩挽李续宾联写道：“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天温诏，再生申甫佐中兴。”曾国藩又撰挽曾国华联道：“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五年以后，李续宾的弟弟李

续宜病死，曾国藩在挽联中还念念不忘三河之败的事，其中上联是这样写的：“我悲难弟，公哭难兄，旧事说三河，真成万古伤情地。”

前面说过，曾国藩经过在家丁忧时的反省，变得更加成熟、老到了。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有当父母都已经不在的时候，才会真正成熟，真正顶起一个家来。曾国藩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现在，曾国藩已经接近五十岁，是个真正的中年甚至接近老年的人了。在此次丁忧以前，他的年纪虽已不小，可心锐气盛，不愿迁就俗流，现在他可是变多了。比如爬山吧，年轻人爬山时，会一鼓作气往上冲，遇到最陡峭的地方，他还会勇往直前，也许他凭着锐气上去了，但也可能会跌得头破血流。中年人不是这样，中年人爬山遇到最陡峭的地方时，他可能会寻找一副登山工具，也可能绕过这段悬崖峭壁，结果他可能比较轻松地爬到山顶，既达到了目标，又节省了许多气力。曾国藩正是这样。当然，在他前面仍然有很多很多陡峭的悬崖，仍然有象这次三河的惨败。但他遇到困难时会多找几条路，多筹划几个办法，同时，仍然用他的老办法：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

另一方面，虽有三河的惨败，曾国藩和湘军的处境还是比前几年困守江西时好多了。经过数年的征战，湖南早已成为湘军的可靠后方和粮饷基地。而湖北自胡林翼任巡抚后，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把一个“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湖北也成了湘军的可靠后方。尤其难得的是，胡林翼虽已位至湖北巡抚，又因攻破九江加太子少保衔，论官位已不下于曾国藩，论权势则已在曾国藩之上，但胡林翼却处处维护曾国藩的湘军最高统帅地位，处处为曾国藩着想。因此，对于曾国藩来说，总的形势和他的处境决没有 1855 年湖口、九江败后那样糟糕。

三河败后，曾国藩嘱咐李续宜收集他哥哥剩下来的军队（少部分拨归多隆阿指挥），加上李续宜原带的军队，李续宜部又成了湘军主力之一。另外，咸丰帝命胡林翼又“夺情”出来署理湖北巡抚。都兴阿因病修养，由副都统多隆阿统率都兴阿所部，以后多隆阿遂成为出色的湘军大将。鲍超和多隆阿在安徽宿松东北战胜陈玉成部太平军，稳住了阵脚。

三、磨砺人才，李鸿章入幕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认识李鸿章是在京师做官时。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象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1843年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曾国藩悉心指点李鸿章。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因为这层关系，当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络。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

李少泉

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上之人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攻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李鸿章年刚而立，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一番大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吕贤基书生带兵，调度无方，不久兵败身死。江忠源又刚到安徽，就遇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绰绰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鼎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祎仙屏。陈鼎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鼎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嫌臃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鼎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打掉他的傲气，使其就范。《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办法。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

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95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之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闿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日记记他们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人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曾国藩的孙婿吴永曾做过李鸿章的下属，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

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李鸿章还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己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他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稿。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养学校，很多人都象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果然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一

般地作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这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信中还说：“阁下阁下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自然个人天分和才干是必不可少的。但也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那么就会有很多千里马被埋没。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对于李鸿章来说，曾国藩就是他的伯乐，就是那个善于养马驯马的人。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他也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而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四、不去四川当“作客”

曾国藩在建昌住了将近半年，一面与石达开作战，一面与从福建返回江西的太平军杨秀清的弟弟杨辅清部作战。与杨辅清作战的主要战场是江西景德镇，石达开则越过江西进入湖南。三河之役后，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请让曾国藩移师援皖，咸丰帝命曾国藩自行斟酌，曾国藩认为，皖北虽败，但因胡林翼夺情视事，再加上都兴阿、多隆阿和鲍超几次大败太平军，皖北的局势已经稳定，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攻下景德镇，免得太平军进攻江西湖

口，有碍大局。得到咸丰帝允准，曾国藩也就没有去福建。1859年3月16日，曾国藩离建昌北上，于20日抵抚州，以便就近指挥景德镇战事。5月29日，曾国荃从家乡来到抚州军营，曾国藩命他率原吉字营，再加上新招募的湘勇，共五千八百人，加入进攻景德镇的战斗。

石达开这一边，自江西、福建交界一路向西，1859年3月初，石达开据守的江西南安被湘军攻占，石达开就势进军湖南，人马连续六昼夜强行军，接连攻占宜章、兴宁、郴州，5月，围攻宝庆（今邵阳），大军十万，号称二三十万。一时湘、鄂均为之震动。石达开打到湘军的老家，湘军军心不稳，都想回去保卫湖南。当形势紧急的时候，曾国藩甚至与在湘乡老家的曾国潢议论是否需要搬家避祸的问题。曾国藩命萧启江一军追石达开回湖南，并由骆秉章指挥。在湖北前线的李续宜也以母病为名想回湖南，胡林翼只好因势利导，让李续宜带所部五千人回湖南增援。石达开虽然到了湖南，但他意不在湖南，他知道他即便在湖南的战争中取胜，他在湘军的老家也无法站住脚。因此，他的意向是四川。在清政府方面，对石达开入川的动向非常紧张。胡林翼认为，如果石达开占四川，不但长江上游天险尽失，清政府的财赋来源中断，而且湖北会遭到陈玉成、石达开东西两面夹击，非常危险。如果由曾国藩援川，不但可以保住四川，而且还可能为曾国藩谋得一个总督的职位，恰好这时四川有人事调动，原四川总督王庆云调两广总督，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如何说动朝廷呢？胡林翼觉得自己和曾国藩关系过密，不便出面奏请，即便是出面奏请，朝廷也未必允准。聪明的胡林翼想到了那草包总督官文。这时候的官文，已经对胡林翼言听计从，于是，一份请曾国藩援川的奏折到了咸丰帝手里。

但是，令曾国藩和胡林翼大失所望的是，对曾国藩有着根深